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戴元光◎主编

The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ultru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 的分野与融合

韩瑞霞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主编：戴元光

美国传播研究与文化 研究的分野与融合

韩瑞霞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与融合/韩瑞霞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 5

(传播学百科文库/戴元光主编)

ISBN 978 - 7 - 5000 - 9343 - 5

I. ①美… II. ①韩… III. ①文化传播—研究—美国
IV. ①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973 号



策划人

韩银星

丛书编辑

于淑敏

责任编辑

于淑敏 马 蕴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2 千字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0 - 9343 - 5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传播学百科文库》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设计的、反映当代传播学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的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丛书，作者主要是近年来活跃在传播学研究前沿的青年学人，也有年长的学者，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新秀。入选丛书的专著主要标准是“新”；或是话题虽老，但观点“新”；或是话题新，观点也新；或是新人新作，或是研究空白点。

收入丛书的 15 本著作，主要为两个系列：传播思想史论系列主要是对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乏新论，其中西方学人研究是对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的系统研究。这些学者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又对传播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传播学前沿理论系列主要研究视野是当前的关注点，主要是对中国相关学科的研究。

传播学科可能是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年轻的学科，西方的研究不过百年，中国的研究近 40 年，但传播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却是任何学科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包括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媒介对人的影响，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已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媒介对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社会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人的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也已经是现实，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研究生命）约 35 年，而我们之所以用三四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套丛书，和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有关。

传播学从西洋传来近 40 年，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态，指示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路径。但我们又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与国际水平也有很大差距。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播学研究整体上比西方落后，整体上处于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当落后；传媒政策及媒介经营理念滞后；媒介结构单一，制度供应不足；资源整合能力低，融资途径不足；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膨胀；传媒呈现精英化趋势；面临国际国内多重冲击与压力，面对因社会发展、互联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体意识消解、社会信任危机、公共观念淡薄等新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新文化价值建构。

本丛书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坚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力采争鸣与探索、批评与反批评的向度，因为探索、争鸣、批评是走向真理的桥梁。

在丛书出版时，我写了以上的文字，爰充为序，以求教于方家。

戴元光

2011 年初秋于上海

序

本书从对美国传播研究二元对立的演进历程进行历史回溯开始，指出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是美国传播研究两种路径发生的内在知识背景，这两种路径的对立为英国文化研究的进入提供了契机。而英国伯明翰大学发生的文化研究学派其发生、发展都与“传播”深刻地构连在一起，这既体现在早期代表人物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霍尔（Stuart Hall）等人对传播的关注上，也贯穿在文化研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特别在进入美国以后，文化研究的特色更是与传播学直接构连在一起，文化研究的美国化（指在美国的重新地域化）即是在与“传播”议题的构连中发生的，由此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北美主流的行政研究路径的传播文化研究路径（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就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在其内部亦存在差异，即凯瑞（James Carey）代表的美式文化研究路径和 Grosberg（Lawrence Grossberg）代表的英式文化研究路径的不同。凯瑞把威廉姆斯的“文化”观念与杜威的“传播”和“共同体”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传播和文化的同一观；而 Grosberg 基于英式文化研究立场，在把“传播”看作文化研究展开的“场所”（site）的同时，提出了反传播的传播观（anti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主张二者的适度分离。二者的差异进一步反映在他们对“传播”与“文化”概念的不同解读中。北美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作为整体的面貌显现还体现在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开始的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长期对话中，集中表现为1995年《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中格罗斯伯格和凯瑞与伽汉姆（Nicholas Garnham）的对阵，两种思潮的对立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在传播研究中的显现。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北美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视角出发，考察了在凯瑞和格罗斯伯格之间的北美其他传播文化研究者，他们既包括费斯克（John Fiske）、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包括波兹曼（Neil Postman）、伯格（Arthur Asa Berger）、罗尔（James Lull），还包括北美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差异”和“同一”的追溯中，梳理了北美传播的文化研究生态。最后，作者认为，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是建基在与时代“语境”构连的“问题”意识基础上，尽管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没有生成一个统一的内在知识体系，但是从问题出发的知识构连对于当前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韩瑞霞是我指导的博士中非常优秀的一位，我们有过许多合作，包括现在。她有很好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训练：本科和硕士学习社会学，博士阶段研究传播学，期间在北京大学进修社会学，在美国杜克大学接受刘康教授的指导研究美国传播与文化研究问题，后又在英国传媒重镇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习。韩瑞霞博士是很勤奋且有灵气和悟性的年轻学者：读博期间，不管我给她布置什么研究任务，她从未叫苦，总是不声不响地按时完成，对我从不是简单的服从，常常提出不同的建议和问题同我讨论。可以认为，韩瑞霞是我指导的博士中非常优秀的一位，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例证，尽管我认为这篇论文可以做得更好。

在她将博士论文作新的修改并付梓出版的时候，我为她的书写下如上文字。是以为序，并共勉，期待她奉献更多的成果。

戴元光
2013年10月于余山

目 录

丛书总序	1
序	3
第一章 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构连”：背景与方法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国内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美国传播研究的现状和文化研究的进入	13
第三节 研究设计	27
第二章 美国传播研究的发生、发展及范式对立	43
第一节 美国传播研究的历史溯源	43
第二节 两种路径传播研究的美国背景	67
第三章 文化研究的发生及在美国的“重新地域化”	91
第一节 与“传播”构连的文化研究发生发展史	91
第二节 传播学图景中的美国文化研究	108
第四章 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传播文化研究路径 在美国的展开	125

第一节	格罗斯伯格和凯瑞的差异：传播式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传播	125
第二节	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对“传播”与“文化”的解读 ...	144
第三节	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对话	166
第五章	美国其他的传播与文化研究：以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为名	189
第一节	约翰·费斯克与他的媒介文化研究	189
第二节	道格拉斯·凯尔纳与他的媒介文化研究	202
第三节	伯格、波兹曼、罗尔：传播的文化研究路径？	215
第四节	传播与文化：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	229
第六章	语境构连：反思与启示	242
第一节	“问题”出发的“语境”“构连”	242
第二节	语境观照：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启示	254
参考文献		267
索引		288
后记		302

第一章 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 “构连”：背景与方法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国内研究现状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一直是传播学学科内的一个固有论争，反映了西方从启蒙时期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是韦伯（Max Weber）所言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博弈的一个产物。然而传播学在20世纪50年代战后美国崛起的背景直接决定了其结构功能主义的行政研究范式的主导地位，这也间接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播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要倡导方向的研究路径，但是随着所谓现代性事业的失败或曰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价值的经验研究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亟须重新回到启蒙时期的原点来寻求新的可能性，这也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相异于康德《何为启蒙》^①提出的现实背景。在传播学学科内部，则反映为亟须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有一次再认识，如果仍然把其典型地定位

^①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Rabinow (P.)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32 - 50.

在与经验主义的对垒位置是否已经限制了其自身的生长力？或者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是否会进一步限制传播学与当代思潮的对话能力？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回到传播学批判理论发生的原点去探究它们的发生、发展和在当代的流变，因为这些理论的变化正是以回应现实为发展内驱力的。发源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学派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历程正是很好地反映了批判研究的现实演进路径，其从诞生之日起对传媒的关注就奠定了其在传播学学科领域内的重要地位，而美国作为传播学主流行政研究或曰实证研究的发源地对文化研究的接纳则更好地反映了它在传播学学科内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或非主流（alternative）传播研究的可能性。那么到底美国传播研究和文化研究呈现什么关系，其与主流的行政研究路径呈现什么格局，与其他批判支派又存在什么样的争议，文化研究视角内的传播研究有哪些特殊见解，这些问题构成本书选题的出发点。而从宏观背景来说，主要为以下三种因素使然。

（一）历史现实背景

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新闻传播业背后的首要价值，这从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宁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的选择中可见，最近这一价值在奥巴马（Obama, 2009）“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演讲（Statement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①中再次得到重申，但是反观美国从 18 世纪建国以来自由主义传统在新闻传播业中的实践，媒体的自由主义价值背后是国家、公司的利益勾结，自由、平等、民主普适价值之下则掩藏着非西方价值的“东方主义”，“新闻把关人”制度实行同时却出现媒体的一系列“妖魔化”叙事，传媒与政府的二元对立最后实现的恰恰是二者的奇异结合，而正是这样的理念、价值却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向外推销的文化标识和产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交两大阵营发生瓦解的同时，左派与右派的对立亦逐渐地消失在历史舞台中，而所谓的新

^① Obama (2009), Statement on World Press Freedom Day, 2009. 5.1 Administration of Barack H. Obama, <http://www.gpoaccess.gov/presdocs/2009/DCPD-200900314.pdf>.

左派、新右派也越来越淹没在后现代主义、族群政治的洪流中，在此语境下，微观地探寻传媒研究在批判视野中的展开不仅能够揭示西方知识传统内部对传媒研究的不一样的道路，同时也能发现传媒发展与当代语境的结合方式。

（二）学术知识背景

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一直存在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从最早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维坦”（Leviathan）的论述，到洛克（John Locke）关于自由和政府的博弈分析，再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新闻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成为后来以“政治干预”为第一己任的文化研究学派兴起的先天土壤，而文化研究视野的人文批判路径也一直是英国传媒研究的特色。与此同时，在美国则是以二战以来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为代表的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发展而来的传播的经验研究为主流路径，它实际上继承的是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来，经芝加哥城市人种学和伊利诺伊的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发展而来的支脉。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一批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的美国学者的回归和其他学者向美国的迁徙，文化研究开始成为美国传媒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在传播学内部促成了1983年和1993年分别名为“领域的骚动”和“领域的未来”的两次大论战，进一步的文化研究在90年代中期实现了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向美国伊利诺伊的中心转变。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一直背负着“大篷车”（a caravan, Dwight Conquergood）^①的污名，因为20世纪重要思潮及学派，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似乎都可以纳入其中，那么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进入美国的，它在以传媒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与这些复杂的学术思潮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运用这些丰富理论资

^① Grossberg, Lawrence (1997b), *Where is the "America" in American Culture Studies,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87.

源的文化研究对传媒到底有何特殊论述，这些成为本书选题形成的知识背景。

（三）传播学学科内部背景

从美国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处于不断的尴尬和麻烦之中，从一开始对施拉姆（Wilbur Schramm）《传播学概论》的引介，传播研究就一直志在寻求不同于“党的喉舌”的西方知识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一目标力图通过大量引入美国经验研究的传统来实现，结果导致陷入量化研究的旋涡，与此同时传播学本身的量化研究层次又受到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些相对成熟学科的客观“挤压”，随着美国量化研究代表的经验研究的保守倾向逐渐受到质疑，中国传播研究也不得不开始寻求自身的批判力量，但此时却发现传播、传媒作为现代社会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抢占先机，传媒的发展和传播议题重要性的日趋凸显不仅没有带来传播学学科地位的上升，反而在事实上使传播学再一次陷入了学科合法性的泥淖，可以说传播研究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在内，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传播研究因为其行政经验研究的保守性而被批评缺乏批判意识，在外，则饱受其他相对成熟学科的挤兑打压，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潮风起云涌的情势下，显然已经很难靠传统的划地而居的方式确立和提升一个学科的合法性，因此探索出自身在这场知识盛宴中的谱系位置就成为传播学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对美国传媒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注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美国的传媒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建制中分处在两大不同的板块中，一是传统的新闻传播院系，主要以经验研究为特色、以职业取向为目标；二是传播研究系和各类传媒研究中心，以批判为己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与其他研究和思潮汇流，形成具有学术生长性的各类研究项目。这一板块在结构功能主义逐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就为传播学成长为对时代知识语境具有批判回应力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能。对传播的文化研究也正是在这些传媒研究中心蓬勃展开的，因此了解

这一谱系，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走出路线斗争牺牲品的阴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进一步为具有时代批判力度的传播研究展开厘清道路。那么国内就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有何论述？

二、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就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相关论述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块：（1）在传播学学科领域中，把文化研究作为批判路径的一种，即范式角度；（2）针对英国传媒与文化研究关系具体脉络的介绍梳理；（3）对传媒研究文化转向的分析。以下就将对这三种研究类别进行概述。

（一）批判范式中的文化研究

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实证研究和人文研究对立划分的基础上，国内传播学者在人文研究取向的批判学派内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如李彬把批判学派分为三种研究路径：以英国莱斯特学派默多克（Graham Murdock）、戈尔丁（Peter Golding）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发源地的文化研究学派以及以美国席勒（Herbert Schiller）、卡茨（Elihu Katz）、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等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路径。^① 与之类似的还有陈力丹从方法论层面划分为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② 经验功能学派主要指从四大经典奠基人而来的以实验、调查、文献分析和实地了解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其在社会学中可以追溯到涂尔干传统，都是继承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精神，再在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下，经由芝加哥城市人种学和符号互动论学派发展而来。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有英尼斯（Harold Innis）、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梅洛维茨（Meyrowitz, Joshua）和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人，他们以技术与社会变迁为核心的研究被统称为媒介

① 李彬（2001），《批判学派纵横谈》，《国际新闻界》，2001（2）。

② 陈力丹（2000），《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生态研究，而这一学派在饱受技术决定论攻击的同时，也随着日新月异的媒介对社会变迁的巨大促发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则是指从欧洲大陆思辨传统经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以及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成的批判研究。在第一种划分方法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与文化研究并列的批判研究路数，而在第二种方法论视角的划分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则与文化研究同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他们的理论基础皆为批判哲学，而研究主题也同为传播与社会。类似从传播研究范式角度进行梳理的还有陈卫星的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的划分^①和胡翼青的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的分类^②，但无论是哪种划分，文化研究都属于传播学批判范式的一种。

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同属批判理论派别，他们的关系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较多一致的看法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属于文化研究产生的“元理论”之一，^③或者文化研究的史前时期。它们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不同社会知识语境中的变种，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批判和政治参与意识，与此同时，它们也有很多不同。如孔令华就对他们研究媒介文化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在研究视角上，法兰克福学派注重从宏观角度出发，批判视角是精英主义的，把受众看成是文化工业造就的被动的同质性的“大众”，研究路数为“压迫—收编”，所用方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化研究则注重从普通民众的微观角度出发，视受众为具有积极能动性的“游击队员”，所展现的结果呈现为“压迫—反抗”模式，在所运用的方法上也更为注重实证的民族志方法+符号学方法。^④由此可见，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悲观的宏大批判特

① 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第14页。

② 胡翼青（2009），《传播学科的兴起：一段重新阐释的历史》，《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③ 赵勇（2005），《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2）。

④ 孔令华（2005），《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征，文化研究则更为注重从平民主义视角进行积极的微观抵制分析。

中国港台学者也有从范式角度进行的类似分析，如杨茵娟就把传播研究学派划分为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她在借用凯瑞、麦奎尔（Denis McQuail）的分析指出结构功能主义代表的经验主导范式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将“权力”置于研究的中心，过于注重生产的分析而忽略对消费的关注，最终易于陷入经济化约论的窠臼。杨茵娟还对美国文化研究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特色进行了区分，她借用莫斯可的论述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受到更多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美国文化研究则是从三个方面获得灵感：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多元主义观念、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及象征互动主义和社会心理学，所有这些都促成美国文化研究肯定（affirmative）的特征。^① 这一特征后来成为美国文化研究最受诟病的地方，即它使美国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后政治”的文化研究，而这似乎与文化研究本身“政治参与”的初衷相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实际上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当代语境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金兼斌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角度出发的对传播研究社会科学范式、诠释研究范式以及批判研究范式的划分。^② 而台湾就传播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著述最多的代表人物为冯建三、张锦华、陈光兴等人。^③ 总的来说，从范式的角度，在传播学科中文化研究多作为批判理论的一种。

（二）英国传媒与文化研究

关于英国传媒与文化研究的梳理与分析，首推赵斌在《现代传播》2001年第5、6期就这一专题所作的论述。《英国的传播与文化

① 杨茵娟（2004），《从冲突到对话——评传播研究典范：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6）。

② 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2）。

③ 冯建三（2003），《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对话》，台湾《传播与管理研究》，2003（2）。张锦华（1992），《批判传播理论对传播理论及社会发展之贡献》，朱立、陈韬文编：《传播与社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1992，第17～40页。陈光兴（2008），《文化研究学科的历史脉络》，当代文化研究网。

研究》一文首先梳理了美国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背景，指出从“佩恩基金研究”到刺激—反应受众模式的形成，再到后来“皮下注射模式”的一些发展变种，都是对美国战后时期媒介对家庭特别是青少年影响的分析，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以及青年学生运动的高涨，注重功能研究的经验研究模式在逐渐暴露出难以满足社会批判需求的情况下，英国传媒与文化研究由此异军突起。在论述中，文章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分别作为文化研究的两个重镇对待（在其他传播研究分析中，多把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与伯明翰大学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对立）。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家霍尔在前人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汤普森（E. P. Thompson）、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基础上致力于对“意识形态”的重新挖掘，这是一个通过“语言阶级斗争”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他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操作的意义实践理论：编码和解码。编码解码理论成为文化研究学派针对青年文化、亚文化、女性文化的一个有效分析工具，既可以运用在文本分析之中也可以运用在经验研究中。同时，霍尔把英国工人阶级的平民主义研究与欧洲大陆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传统、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沟通，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70年代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在实践上，则试图通过对文化现象的阐释和分析来达到一种政治参与的目标。但是文化研究的这一取向在90年代向美国、澳大利亚的扩散过程中逐渐的改变了其初期的一些特质。发源于莱斯特大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则注重对传媒生产的机制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传媒生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过多次论战，显现了批判学派内部的复杂性。总体来讲，从20世纪60年